



回眸村头路

宋今声

早些年，故乡双辽市腰三家子屯只有七户人家，我家住在村西头。小村建在漫漫的荒野之中，房前屋后，杂草丛生，春夏之交，拔节的、穿荳的、爬蔓的、鼓堆儿的，一片片，一簇簇，争青竞绿，蓬蓬勃勃，数不清，叫不全。清晨傍晚，草味花香，飘溢小院；雨过天晴，蛐蛐叫、青蛙鸣，煞是热闹。

离家一里多地的南坨子上，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蒿草和荜条通，那里有鸟蛋、野杏子和欧李秧；每到初秋以后，南坨子便成了孩子们的乐园，但是，一个人不能去，怕被狼叨走。

开春了，家西的大甸子不知是谁点着了火，野火烧尽了隔年蒿草，也烧死了刚刚出洞找食吃的大眼贼和毒蛇子。那抱恋窝的百灵鸟，火燎尾巴了才想逃跑，但是，为时已晚，和肚子底下的一堆蛋蛋一起化为灰烬。一夜春风劲，吹散了草灰，吹绿了草原，吹醒了万物，天上飞的，地上走的，大家又开始忙了起来。

1963年，我辍学后下地干活，从家门出来，要走半里路才能到生产队。那坑坑洼洼的小路，是我们一家老小踩出来的。毛道两边的杂草，春蹿露水夏绊脚，秋天割下做柴柴，冬天下雪，雪岭子陷脚。这条小路，如同一根长线，一头牵着我们家门口，一头连着生产队的大门。

这条小路对我们全家太重要了，爹去村中井沿挑水，妈带我们去姥娘家吃粘豆包，叔叔领我去南坨子收沙子炒爆米花；上大门街看

耍猴的，去碾道推碾子拉磨，反正我们大家要离开家门外出，不论干啥，都要走这条小路。

后来，我渐渐地明白了，这条小路是我们家的一条“动脉”，我们天天在上面“流淌”，带着我们的希望和憧憬，通向四面八方。我不正是从这条小路上迈开稚嫩的双腿，走出家门，奔向社会、走到今天的吗？

弯弯的小路，如同一缕绵绵情丝，缠绕着逝去的岁月，捆绑着甜甜的乡愁。每次回到故里，自然少不得循着童年的记忆走走看看。那条高低不平、随弯就直的小路，同小村一样，已经不见了踪影。我感到无边的失落与惆怅。我打量着，原来，小路已经被横贯东西的大路所拦腰截断，大路南北两侧，盖满了崭新的民房；房前屋后，顺着大路两边栽植了奇花异草和垂柳海棠，雨后的泥泞不堪和晴天的坎坷不平没有了；笔直宽平的大路，来往通行着各种车辆，一派兴旺景象。

世事大抵如此吧，变迁与发展是绝对的。落后变为繁荣，困窘化为丰饶，一直是人类的共同追求，愿家乡更美好。

首任梨树县委书记 沈亚钢

单志

一、少年立志 崭露锋芒

沈亚钢，原名沈大勇，祖籍浙江，1919年1月生于北平前门外板章胡同。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沈家原是大户人家，家业殷实富有，家风严谨，家教严格，由于时代变迁、社会动荡等诸多原因，其家由兴盛渐转衰落。

沈亚钢的父亲由于职业关系，一向坚守公平、公正、正义，对旧社会的贫弱腐朽和官方的腐败十分厌恶。沈亚钢受父亲言行、道德、家风的影响和熏陶，从小就对现实打上不满的烙印。他聪颖好学，1927年春入北平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书。1932年小学毕业，他以优秀生的资格被保送到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同年春天，他父亲不幸因病去世，由此，家庭生活日趋艰难，家庭的经济来源只靠在汽车公司当职员的同学哥哥沈大政的微薄工资。家庭状况促使沈亚钢早熟，他除了认真学习课业外，还大量阅读课外书籍充实自己，沈亚钢的母亲和姐姐也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希望他刻苦学习，长大出人头地，能撑起这个家。

随着年龄的增长，视野的不断开阔，课堂以外的新知识、新思想引起沈亚钢的强烈兴趣，他接触进步文字和新兴社会科学，阅读鲁迅、高尔基中外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和社会科学书籍，内心产生了坚定地爱国报国情怀。

抗战胜利后双辽根据地的建设和作用

王福山

第五 救治伤病员

双辽全境解放后，在解放沈阳、长春、四平的历史战役中，双辽派出多支担架队赴前线参加伤病员救治。仅三战四平和四战四平两次战役，全县出动担架23444副。在1948年3月的四平收复战中一天就接收伤员1600人。担架队员和民工冒着敌人的炮火向前线运送物资和伤员。在四平战役中刘良、刘景和、杨焕珍、杨树怀、杜万春等双辽担架队员牺牲在战场上。刚刚获得解放的双辽人民把部队的伤病员当做亲人。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从火线上抢下很多伤员；担任做饭的杨春和，只要每次做完饭就主动上火线去抢救伤员。在四平战役中，担架队员刘阔生、赵万良运伤员时把自己的衣服脱下给伤员盖，王永安拿出自己的钱给伤员买鸡蛋吃，高中申用自己的饭盒给伤员接尿。战时，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攻打四平最激烈那几天每天午后最多时1600多人。伤员一到就把募集来的烧饼、鸡蛋送给伤员吃。负责把伤病员运到在郑家屯的三个战勤医院（一所设在原天主堂，二所设在原义原大，三所设在原俊峰楼浴池）。1948年双辽医院也设在郑家屯（院址在现在的市委院内）。由医护人员包扎处理后，再中转到各兵站。伤病员多时，很多老乡家把自己的好房子，热炕倒出来给伤病员住。如原老爷庙一带和勃山屯都住过伤员，为伤员烧水做饭；居民老曲头把自己的被拿给伤员盖，自己侍候伤员；兵站工作人员刘顺、任庆祥等送伤员时，对伤员照顾得无微不至。设在郑家屯的省立第四中等单位的青年自动组织“献血队”，献出自己的鲜血救治伤员。为了改善伤病员的伙食，白市村村长自愿为伤员捐献1头猪，其他村民共同送给伤员1头牛。1948年3月四平收复战打响之后，辽北省政府成立了以于文清为团长的劳军慰问团，两次赴四平前线慰问全体指战员。第四野战军入关参加平津战役期间，还到天津前线慰问四野指战员。阎宝航主席和夫人高素桐女士多次到郑家屯火车站迎接慰问来郑家屯治疗的负伤将士。

第六 优抚荣转军人和军烈属

为了做好安抚荣军，优抚军烈属工作，双辽县专门成立了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具体负责这项工作。为了让参军人员在前线安心打仗，家属

第二编 四平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1年9月—1945年8月）

党史

第十章

四平社会各界的抗日斗争及四平的光复

日本侵略和残暴的殖民统治，激起除极少数汉奸之外的全体四平民众的反抗。在义勇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之外，四平各阶层民众，以各种方式，开展非武装斗争，打响了一场无硝烟的战争。这些非武装斗争，既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情报战线的斗争，也包括社会各界的反日斗争，给日本在四平地区的殖民统治以沉重打击，成为四平和东北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爱国官绅的抗争

四平地区沦陷后，日本侵略者为收买人心、笼络社会名流为其殖民统治服务，曾“邀请”多位有声望有地位的官员在伪政权中担任职务，但遭到了爱国官绅的拒绝。张识尘、马龙潭是其中的代表。

张识尘，1886年生，梨树县小城子人。清末举人出身，考取保定军官军校，官费保送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在日本期间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1923年就任孙中山大元帅府任命的东莞县县长，1924年就任大元帅府参议院谘议。1928年回东北参加劝说张学良改旗易帜工作，因病回家省亲，遂留东北，贫病交加，不改志节。1932年，溥仪派张景惠出面，劝说张识尘出面参与主持东北治安维持会，被张识尘断然拒绝。他义正词严地对张景惠说：“我随孙先生革命一生，志在反清灭洋，信念至死不变，怎么还能为帝国做事？”[张骐：《一位老同盟会会员——张识尘》，政协梨树县委员会编：《梨树文史》下册，第369页。]此举得罪了日伪当局，张识尘从此被冠以“政治犯”软禁在家中。1946年春，盼到东北光复的张识尘，在小城子家中病逝，中共梨树县委按民主人士待遇为其购买棺椁寿衣，对其追求民主进步、不与日伪伍的高风亮节给予充分肯定。

马龙潭是东北政要，中华民国陆军中将，先后担任过东边道镇守使、洮昌道道尹、四洮铁

路局督办等职。1923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时，马龙潭曾代表中国政府给日本赠送粮食，因此获得日本天皇授予的一枚勋章，后来被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列入亲日分子名单。说明马龙潭在日本人眼里的地位非同一般。

1931年10月21日，《盛京时报》载文说：“中满自治会”，于10月15号在四平街万字会地址正式成立，指定马龙潭为会长，统一管辖昌图、辽源、梨树、怀德、开原五县之一切行政，该五县原政府宣告撤销。日本方面是想让马龙潭担当这个会长角色，但当初征求马龙潭的意见马并没同意，日本宪兵队就以马龙潭名义四处张贴“中满自治会”成立的布告。已年逾七旬的马龙潭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他拿起“文明棍”来到日本宪兵队，质问宪兵队长林清，并提出派人将以他的名义张贴的布告一律撕下来，登报更正。林清初则以礼相待，继之软硬兼施，劝诱马龙潭顺从关东军的旨意。马龙潭坚决拒绝，并用头撞桌角、撞墙，以死相拼，马龙潭又亮出日本天皇授予他的勋章。见此情景，林清怕事态扩大，只好答应了马提出的条件。不久，天津《大公报》以“马龙潭触日人之怒”为题报道此事，对马龙潭的民族气节倍加赞扬[贾振铎：《沦陷后的四平街》，《四平文史资料》（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辑）第五辑，第44—45页。]。

七七事变发生后，伪政权的汉奸要员派人请马龙潭进关“当官求荣”，他愤怒地痛斥道：“你们谁愿意当汉奸谁去当，我是宁死不去的！”[文彤林：《爱国官绅马龙潭》，《四平文史资料》第一辑，第122页。]

此后马龙潭未在伪满政界担任任何官职。加上他常做慈善之事，如捐款办学校、救济穷人等，他在四平人眼里是一位爱国的开明人士。

像张识尘、马龙潭这样的爱国老人还有许多。家住四平市道东南二马路的宋秀璧也是一位爱国者，他原是张作霖时期的奉军中将，负责奉天兵工厂的工作。在伪满时期，日本人多次请他出山，都被他婉言拒绝了。他憎恨日本的统治，宁可饿死，也不做日本人的走狗、帮凶。他曾指名大骂投靠日本人的王永清，在日本主子面前摇头乞怜，没有一点中国人的骨

气，甚至不如一个妇道人家。他家养了4条哈巴狗，分别叫大白、小乡、小木、小庄。光复后，他解释说，这4条狗的名字分别是日本元帅白川、日本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日本大将乃木希典，日本大将本庄繁，以此来表达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恨[薛世杰：《一位刚毅爱国的老人》，《四平文史资料》第一辑，第124—125页。]

毕赞华是四平街电灯公司经理兼董事长，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三天，日商四平街电气株式会社派人洽谈购买电灯公司的厂房和设备，毕赞华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以理拒绝。日商多次软硬兼施，威胁利诱，但毕赞华不为所动。1933年初，大同电气株式会社凭借日伪权势，强迫四平街电灯公司停止发电，由大同电气株式会社批发电力，变发电厂为电力零售商。1938年春，由于日本侵略者强制推行电气一元化的政策，迫使众股东忍痛将四平街电灯公司“卖给”“满洲”电业株式会社。毕赞华被安排为伊通县电业局局长。他以年老体弱不能胜任为托词，拒不受命，归家隐居[《四平市志》（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4页。]

还有官员利用在伪政权任职的便利条件，不顾个人安危，冒着巨大危险为反满抗日的爱国者提供各种支持和帮助。马骥图，原名润麟，梨树县城人。1938年在梨树中学毕业后，考入伪满洲国司法部在伪新京（长春）建立的法大第二期。1940年毕业后，在伪满四省省监察厅任书记官。素有爱国思想的马骥图以书记官的合法身份为掩护，多次暗地保护和帮助爱国抗日人士。

当时，有不少人从关内如延安、重庆等地或受党组织派遣或自愿来东北参加抗日斗争，凡途经四平与马骥图取得联系的，马骥图都会舍生忘死保护，想方设法使其躲过盘查、追捕，并安排食宿、乘车、行动路线，竭尽全力保证他们的安全。

（未完待续）

